

CHRONICLE OF MACAU

澳门 编年史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 主编

第二卷 清前期

(1644—1759)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CHRONICLE OF MACAU

澳门 编年史

吴志良 汤开建 金国平 主编

第二卷 清前期

(1644—1759)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目录

第二卷 清前期 (1644—1768)

第一部分	归附清朝 (1644—1661)	511
第二部分	迁海之困 (1662—1683)	579
第三部分	康熙开海 (1684—1722)	661
第四部分	额船制度 (1723—1735)	841
第五部分	乾隆定例 (1736—1759)	907



第一部分 归附清朝

(1644—1661)

顺治元年（1644年2月8日—1645年1月27日）

6月6日，摄政王多尔袞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宣布“定鼎燕京”。^①

6月7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诏明年改元弘光。^②

7月12日，澳门葡人与郑芝龙秘密协商，共同经营对日贸易。由郑芝龙派船来到澳门，装载葡萄牙运往日本的货物。当时澳门耶稣会也将存放在圣保禄学院的几箱快要腐烂变质的货物冒险置于中国船只上赴日交易。这次贸易十分顺利，中国船只从日本返回时载满了货物，澳门葡人从中获利甚丰。郑芝龙十分重视与葡人的友谊，贸易中十分守信，而且他只收运输费用。^③



郑氏后人绘郑芝龙像

7月26日，安南人安德烈（André）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a）殉教，年仅19岁。他的遗体由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神父运回澳门，葬于圣保禄教堂。^④

①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世祖纪》1。

②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福王登极》。

③佚名：《1643年末—1644年末东印度公司大事记》，转引博克塞（C. R. Boxer）：《郑芝龙（尼古拉一官）兴衰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10月；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1页。

④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 79.

8月9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欣德（Hinde）”号抵达澳门进行贸易，受到葡萄牙人友好接待，但中国官员提出要丈量船只交税，约需交纳3500卢比（rupee）。英国人觉得很不合理，合理交付应不超过800卢比。早年“伦敦（London）”号比该船大，而仅仅交1400卢比。同时，他们的贸易也不理想，由于缺少商品，他们只运回瓷器和金制品。^①

9月1日，日食，顺治帝派遣大学士冯铨同内大臣等督率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暨钦天监正戈承科等，各带自推之日食图表，登台凭验，验得西洋新法，密合天行。即颁旨行用新法，并于历册面传批“依西洋新法”五字。礼部疏称：钦天监改用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颁行。和硕睿亲王多尔袞赐名“时宪历”，其历日面页开载“钦天监依西洋新法，印造时宪历日，颁行天下”。^②《澳门记略》称：“三巴寺僧世习其业（指天文历法），待其学成，部牒行取，香山县护之如省，督抚资遣入钦天监。”^③

10月6日，广东提举司根据广东巡抚在广州下达给香山县令的批示，赐地安葬陆若汉（João Rodrigues）神父，同时赐碑。该碑本应树在青洲对面的新围墙之内，后来中国官员认为应立于临水的湾仔岛银坑山山脚。26日，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谭玛尔（Gaspar de Amaral）神父在湾仔岛银坑新赐地树起四根木桩，上写“这块土地是广东巡抚以明朝皇帝的名义赐给圣保禄教堂的神父们作为安魂之所”。几天之后，这些木桩被人拔掉。^④

10月，澳门当局宣布将所有的西班牙人驱逐出澳门，包括三名圣家辣修道院（S. Clara）的西班牙女修士（先来者六人，已死去三人）及在澳门

①马士（H. B.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卷，第32页。

②黄伯禄：《正教奉褒》顺治元年八月朔。

③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卷下《澳蕃篇》。

④阿儒达官图书馆：《耶稣会士在亚洲》JA 49-V-13，转自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1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1页之10月6日事，将Tequesy（提举司）译成钦差和特使，致使引用者产生很大错误。1644年弘光帝并未派钦差来广州处理陆若汉墓地之事，而是广东地方政府的处理意见。由于没有皇帝的旨意，故1644年赐陆若汉墓地的所有权尚得不到承认。此处引用《耶稣会士在亚洲》葡语译文由金国平先生重新翻译改订而成。

避难的方济各会利安当（Antó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和他的同伴。11月，利安当等人抵达安南岷港（Da Nang），他们在安南受到国王的接待，然后返回马尼拉。^①

11月1日，澳门议事会发表声明，对荷兰人的劫掠行为表示，并派一位葡荷双方都能接受的重要人物、船队指挥安东尼奥·瓦雷拉（António Varela）前往巴达维亚谈判，要求收回被荷兰人劫掠的部分财物。^②

11月7日，澳门议事会理事官劳伦索·科尔代罗（Lourenço Mendes Cordeiro）给若奥四世（João IV）写信请示，是否可以同袭击澳门船只的荷兰人修好，否则，澳门将会再失去四万生灵。^③

11月1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与葡印总督特雷斯·梅内西斯（Dom João da Silva Teles de Meneses）签订条约。除划分锡兰（Ceylon）玉桂产地的临时协议外，还将“泡乌（Pauw）”号船及其船员、货物全部归还荷兰，荷兰亦将今年所截获葡方俘虏及价值30万荷兰盾（florin）^④的货物归还葡萄牙。条约于1645年1月25日在果阿公布，荷葡之间在东方的划界及停战终于实现。^⑤

12月25日，东京国王下令逮捕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第二年6月将其关进顺化大牢，7月3日又将其判处死刑。后由于异教徒求情，改判第三次将其驱逐出境，并于当年返回澳门。^⑥

本年，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l Boym）抵达澳门，先学习汉语，

①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493—494; 韩承良：《中国天主教传教历史：根据方济会传教历史文件》，第33页。

②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 81.

③文德泉（Manuel Teixeira）：《关于澳门土生人起源的传说》，载《文化杂志》第20期，1994年。

④荷兰盾，是荷兰王国的货币名称，于15世纪开始流通。

⑤维因克（Marcus P. M. Vink）：《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决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

⑥梅迪纳（Juan Ruiz-de-Medina）：《耶稣会士亚历山大·德·罗德斯在科钦支那和东京：1591—1660》，载《文化杂志》第45期，2002年。



基歇尔《中国图说》的卜弥格像

继在圣保学院担任教师。1647年1月离澳赴海南传教，是最早进入海南岛的欧洲传教士之一。^①

一艘英国科亨公司 (Caurten's Association) 的商船“威廉 (William)”号来到澳门，广州政府立即要求澳门方面切断对该船的食物供应，迫使“威廉”号迅速离开澳门。澳门总督依苏沙 (Luís de Carvalho e Sousa) 致信葡印总督称，今后不要让英国贸易船来澳，同时要求果阿对英国商船停

发许可证。^②

澳门理事官劳伦索·科尔代罗向果阿总督汇报，澳门居民有四万之多，主要是大量广东人为逃避清朝战争纷纷涌进。^③

澳门议事会派一艘帆船来到巴邻旁 (Palembang)，澳门使者费利西安诺·索萨 (Feliciano Caetano de Souza) 与巴邻旁苏丹达成协议，重新修复葡萄牙与巴邻旁的友好关系，允许葡萄牙人带着生丝和中国纺织品进入巴邻旁市场，并购买巴邻旁的胡椒。根据协议，葡萄牙王室的船只

①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Edward Kajdański): 《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7章，第75—76页。关于卜弥格第一次到达澳门的时间有“1645年说”、“1647年说”及“1649年说”，本处采用卡伊丹斯基的说法。

②维因克: 《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决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1993年；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81.

③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79.

可以自由进出该港，除胡椒以外，葡萄牙商人可享受对所有产品的减税待遇。^①

澳门土生人郭玛诺（Manuel Gomes）修士在南昌遇难。郭玛诺，1602年生于澳门，父为巽他群岛之马来人，母为华人。1628年加入耶稣会，后被派至南昌协助谢贵禄（Tranquille Grassaetti）和梅高（José Esevão de Almeida）二神父传教。清军攻破南昌，郭玛诺与二位神父均遇难。^②

澳门有5艘帆船抵达望加锡（Macassar）贸易，1艘赴马尼拉（Manila）贸易，1艘赴东京贸易。^③

顺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

1月3日，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çois Sambiasi）抵达南京，给弘光帝上《为远臣久切祝圣之忧谨修方物之贡并陈一得仰佐中兴盛治事疏》：

臣西极鄙儒，以格物穷理为学，以事天爱人为行，洁己修身。自神宗朝偕先后辈利玛窦等，浮海八万里，阅三年所始观光上国，荷蒙恩泽屡加，亡者与葬，生者给田，即在先帝时，同辈占星修历，制器讲武，效有微劳。又蒙宠锡洊加，礼数隆重，更赐钦褒天学匾额，顶踵戴德三十余年。今幸皇上龙飞，仁明英武，立就中兴大业，访道亲贤，问明疾苦，振武揆文，遐迩毕照，远臣不胜欣戴，向天虔祝，圣寿无疆，敬制星屏一架，舆屏一架，恭献御前，或可为圣明仰观俯察之一资，附贡西琴一张，风簧一座，自鸣钟一架，千里镜一筒，玻璃盏四具，西香六炷，火镜一圆，沙漏一具，白鸚鵡一只，助于礼备乐明者，伏乞皇上俯赐敕收。臣尤蒿目时艰，思有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铕以资战守。盖造化之利，发现于矿，第不知脉络

①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p. 100—101.

②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03页。

③G. B. Souza,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p. 75, p. 94, p. 114.

所在，则妄凿一日，即需一日之费，西国格物穷理之书，凡天文地理，农政水法火攻等器，无不备载，其论五金矿脉，征兆多端，似宜往澳取精识矿路之儒，翻译中文，循脉细察，庶能左右逢原也。广东澳商受雇贸易，纳税已经百年，久为忠顺赤子，偶因牙儉争端，阻遏上省贸易，然公禁私行，利归于奸民者什之九，归于府库者什之一，宜许其照旧上省，在于何地栖止，往来有稽，多寡有验，则岁可益数万金钱，以充国用，况中商出洋，每循海岸，所以多险，西商惟按度数行止，故保无虞，亦可推而习之，所利非小也。西铕之所以可用者，以其铜铁皆百炼，纯粹无滓，特为精工，切照天启元年，东酋跳梁，兵部题奏，奉有取西铕西兵之旨，是以臣辈陆若汉等二十四人，进大铕四位，未及到京，而虜已遁。后奉旨援登，发铕击虜，奇功屡叙，既而辽兵反戈，同伴死节，惟陆若汉带伤赴阙，随蒙兵部题覆，恩蒙圣旨，将已故公沙·的西劳（Gonçalo Teixeira Correia）等，赠官赐葬，陆若汉赏劳南还调理，老死广省，至今未葬，察得澳中三巴寺旁，有海隅僻地，恳祈皇上恩赐一区，掩其枯骨，俾同伴垦种供祀，得以葺筑斗室，焚修祝圣，以报盛世泽枯之仁，而诸商慕义，益以永久矣。更乞敕部取习铕数人，以传炼药点放之术，实摧锋破敌之奇也。至于七政推历，交蚀不爽，必取明习天文西士数人，会同钦天监测算，尤足光示四裔，垂则千秋，臣感恩图报，无有穷已，伏乞圣明敕赐施行。臣即奉命驰澳，矿书必译详明，铕师必访精妙，星速入都，不敢少缓，其明历识矿西士、善铕西将，乞敕量给应付廩粮，起送入京，不致稽缓。庶于时艰有济，而臣之微忱，亦得少效于万一矣，臣曷胜瞻仰祈祷待命之至，伏候敕旨。^①

1月4日，弘光帝圣旨批复：“海禁初开，毕方济着刘若金带往海上，商议澳舶事宜，陆若汉准给地安葬，所进星屏等物，司礼监察收。”^②

①《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毕方济奏折》，第911—918页。按：原疏无系年，只有上疏月日，黄伯禄：《正教奉褒》，第479页将此疏系于崇祯十二年（1639），学界多同黄说，误。此疏实应上于崇祯十七年（1644）十二月初六日。详细考证，参见汤开建、王婧：《关于明末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奏折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毕方济奏折》，第918页。

1月6日^①，司礼监查收毕方济代表澳门教会与澳葡政府入贡南明弘光政权的贡物计有：星屏一架、舆屏一架、西琴一张、风簧一座、自鸣钟一架、千里镜^②一筒、玻璃盏四具、西香六炷、火镜一圆、沙漏一具、白鹦鹉一只。^③

1月13日，令大西洋人毕方济随都察院右金都御史提督福建、广东沿海开垦屯田、市舶、鱼盐、桥税、珠池兼理海防军务刘若金同往海上商议澳门海上贸易之事。^④

1月，奥地利耶稣会士瞿安德（Andreas Wolfgang Koffler）神父抵达澳门，不久即进入内地到广西开教。^⑤



澳门内港西面的对面山

①李清：《南渡录》卷4，载《南明史料（八种）》，第301页。

②千里镜，即望远镜，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由伽利略制成第一架望远镜。明天启时即已由汤若望携带第一架望远镜进入中国，最早向中国人介绍西洋望远镜者即西教士阳玛诺（参阅方豪：《伽利略与科学输入我国之关系》，载《方豪六十自定稿》第68—69页）。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制器篇》：“望远镜，来自大西洋国，用筒数节，安玻璃两端，置架上，视远如近，视小为大，可以远望敌人营帐、人马、器械、辎重，毫发不爽。我可预备战守，安放銃炮，曾葺海上一镜，因天气晴朗，见渔网于一百二十里外，亦奇关。近日西洋陪臣贡献御前，间有鬻者，直四五十金。”

③《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2册《毕方济奏折》，第918页。

④谈迁：《国榷》卷130，崇祯十七年十二月庚午。

⑤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ia）：《中国年札（Cartas Anuas da China）》，第269页；裴化行（Henri Bernard）：《明末耶稣会一封信（1645年12月2日）考释》，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5号，第4857页。

4月18日,为了确定对澳门西边对面山墓地的拥有权,谭玛尔(Gaspar de Amaral)神父再次接管陆若汉墓地,在位于银坑东边小山上树起一座十字架。因为原来所树的木桩标志已经被中国人破坏了。由于有提举司的公文,还在银坑附近开采了石料。^①毕方济神父携带弘光帝的诏谕来到后,耶稣会士想要一个更有发展前景的地点,结果得到一块无主荒地,其面积估计比青洲大四倍,其范围从拱北东南部山脚开始,一直延伸到海边被称为蚝埕的地方。此地距妈阁炮台很近,在内港的入口处,又几乎正对着马骝洲^②。拥有这片土地后,又在附近辟出地方安葬耶稣会士游文辉(Manuel Pereira)和安东尼奥·梅斯基塔(António Mesquita)。稍晚,耶稣会士和奥斯定会士在银坑一带建造了两座小教堂,在对面山的蚝埕,多明我会士则占领了银坑(Ribeira Grande)地段。^③龙思泰称:“在河的对岸,隆起的山脊,澳门的葡萄牙人称之为Lapa(对面山),豪斯伯格(Horsburgh)在他的地图中,标为对面山或神父岛(Padre Island),即指Lapa(对面山)东南边上由耶稣会士开垦出来的一片土地,由一位皇帝的命令,东南部分被划作为一位为中国政府效劳过的葡萄牙耶稣会士的墓地,他的同会兄弟们在1645年占有了这块地方,并开始侍弄这块荒地。这项工作进展很快,10年后,这块土地便以神父岛之名而著名,在1655年荷兰使团绘制的地图就标有此名。”^④

4月29日,弘光帝命毕方济为钦差大臣出使澳门,宣布开放海禁,允许葡商自由贸易之诏令。其文如下:

尔毕生为贵国尽职服务,忠诚谨慎,且精通科学,而今朕命尔为钦差大臣,赴广东向澳门城的商人开放海禁诏令,安抚众人,商船可往返,中华赖有供应,人民得以便利,朕发现尔等系……之人,可自由往返贸易,任何人不得阻拦。此事双方共赢;尔等长居镇境,并经常在迁贸他国,此已非一朝之事。兹朕废除海禁,依照律例,所有往来船只,所装商品接受检查,你们追求应得利益,朕亦得便。从今以后,不得受奸人指使,违反律例,不得蒙骗税口,夹带货物,收赃,

①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79.

②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64页。

③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p. 79—80.

④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60页。

否则将遭惩处。朕之官员应为朕着想，善待番商，中外一体，勿滋事，戒突乱。此诏书下达之时尚未缴纳之关税，特赦免缴。尔等忠诚，中华受益，朕当另行开恩，尔等定不会失望。钦差大臣须谨慎行事，使其知晓朕之旨意。为朕事业之效劳，当得重报。^①

临行前，弘光帝为毕方济题词：“诚于事天，端于修身，信义素孚。弘光岁次乙酉春王吉旦立。”^②

4月，澳门奥斯定修道院院长曼努埃尔·罗萨里奥（Manuel do Rosário）修士被革除教区神父职位，驱逐出澳门去果阿。原因是葡印总督菲利佩·马斯卡雷尼亚斯（D. Filipe Mascarenhas）的助手对其不满，后来他又被派往科钦（Cochin）、孟加拉（Bangladesh）等地，1662年担任果阿波普洛（Pópulo）学校校长，1665年在果阿逝世。^③

4月，郑大郁《经国雄略》成书，由明镇守福建等处并浙江金温地方总兵官郑芝龙作序。该书《武备考》卷8有“佛狼机氏甲板大船式”图一幅，并有文字介绍这种佛郎机甲板船。“夷舟”，即甲板船：

红夷所造巨舰，大如山而固如铁。桶坚不可破。上可容千人。用板木合造，可数十万重。中复以竹板、铅板，重重铺塞，用大铁钉，长可七八尺，穿钉如走线然。其厚可六七尺许，复以脂油沸涂于外。滋所不能入。复用牛皮、木板铺钉于内，净光如磨。以白布结帆，上树帆竿数十，连接而上。中间帆索勾引，绊杂颇繁，宛若虫丝蛛网。夷人多瞭望牵风其上。中置巨銃两层，层各置二十四口，虽有飞越之巨筏，终莫能当之者。纵横海外，不患破损，只怕淹没。后舵去船头可二十丈许，话语莫能闻达，凡举事以鸣钟为度。安坐如履平地，风浪不惊。此西夷伎俩，置设战舰之大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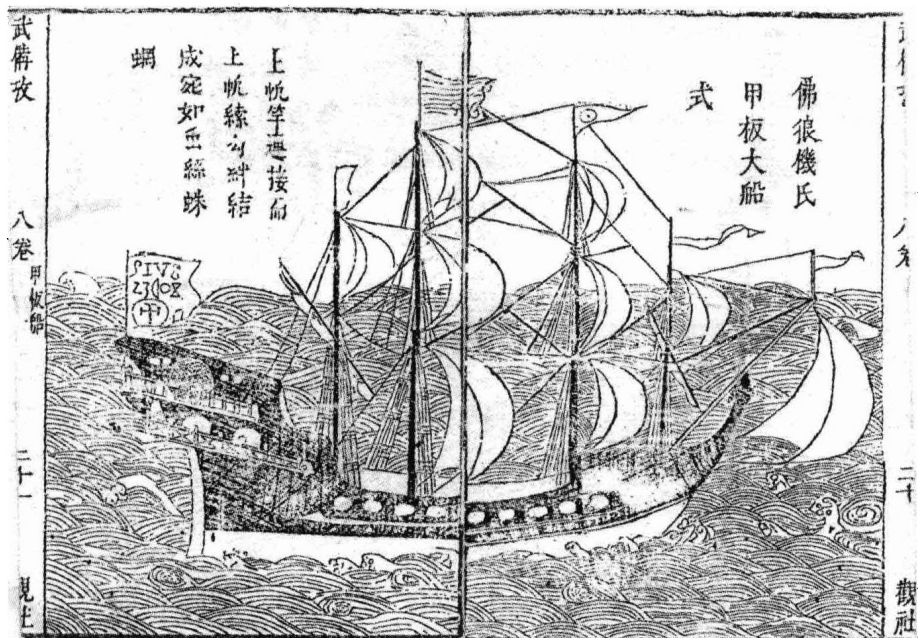
此处郑大郁所名之“佛狼机氏”其实并非葡萄牙或西班牙，实应为“红夷所造”。红夷者，有“英机呢”（英吉利）与“乌喃呢”（荷兰）二种，此处当为荷兰船。^④

①阿儒达官图书馆：《耶稣会士在亚洲》，JA49-V-13fo 38lv—386。

②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毕方济》，第200页。

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550.

④郑大郁：《经国雄略》之《武备考》卷8《夷舟》。



佛郎机甲板大船

5月24日，澳门市民委员会会议决定，不接受葡印总督阿维依拉斯伯爵（Conde Aveiras）的敕令。根据该项敕令，所有进出澳门船只必须交纳其货物（药材或白银）价值的5%作为抽头，以维修该市城堡。^①

5月29日，葡萄牙与荷兰在巴达维亚（Batavia）签订临时协议，双方同意，通过马六甲（Malacca）的一切葡萄牙船只必须支付4.5%寻常利率。在还没有得到巴达维亚通知的情况下，马六甲总督凡·弗里（Van Vliet）已经于6月份对经过马六甲的葡船“圣安东尼奥（S. António）”号及“圣克鲁斯（S. Cruz）”号征收4.5%的税。“圣佩德罗（S. Pedro）”号是从澳门运载500名炮兵返回里斯本的运人船，故免于收费。^②

5月31日，葡萄牙贡萨罗·西奎拉（Gonçalo de Sequeira de Sousa）赴日使团抵达澳门，受到了澳门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③

①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31—32页。

②维因克：《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关于葡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决定》，载《文化杂志》第13—14期。

③姚丽雅：《贡萨罗船长出使日本记（1644—1647）》，载《文化杂志》第54期，2005年。

5月，穆尼阁（Jean-Nicolas Smogoleski）神父到达澳门。穆尼阁，字如德，出身于波兰望族。后从澳门前往江南、福建、北京、云南、广东、海南等地传教。在广东肇庆去世。^①

6月3日，经嘉尔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神父建议，贡萨罗·西奎拉大使与议事会、澳督依苏沙、署理主教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Manuel Fernandes）及法官开会，以了解出使日本的有关情况。^②

6月6日，澳督依苏沙召集议事会成员开会，宣布议事会必须筹集40万澳门元作为贡萨罗·西奎拉使团赴日本的开支，该项请求获得一致同意。^③

6月9日，澳门议事会认为，由于葡萄牙国王没有明确保证今后禁止基督教以任何形式传入日本，这次出使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澳门人对日本禁教的残酷无情太了解了，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不应派使者赴日。因此，议事会决定，不冒险派遣贡萨罗·西奎拉使团去日本，并让贡萨罗·西奎拉率领船队返回果阿。^④

6月，清军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8月6日，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当年即改元隆武。^⑤

7月23日，法国耶稣会士罗历山神父到达澳门。他于7月9日在安南被捕，并被判了死刑，后改为驱逐出境。12月20日，他在郑玛诺（Manuel de Sequeira Tchong）的陪同下从澳门出发前往罗马。1649年6月27日到达罗马，他向教宗和枢机院上书，最先提出创设“宗座代牧制（Vicars Apostolic）”以摆脱西班牙、葡萄牙保教权控制的主张。他认为，应由传

① 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635页；爱德华·卡伊丹斯基：《中国的使臣卜弥格》第9章，第106页。

②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2页。

③ 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52页。

④ 姚丽雅：《贡萨罗船长出使日本记（1644—1647）》，载《文化杂志》第54期，2005年。

⑤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7《闽中立唐王》。

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义派遣代牧主教，直接受命于传信部和教宗，并由这些代牧主教在传教区培植本地神职人员。罗历山的建议后为教廷采纳。他后曾被任命为交州和交趾支那（Cochimchina）的宗座监牧，但他拒绝就任。^①

12月20日，前澳督施罗保（D. Sebastião Lobo da Silveira）乘菲亚略·费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的船离开澳门前往印度。他是个骄傲自大而又心地狠毒的人，残酷地杀害了王室金库代表瓦斯·弗莱雷（Diogo Vaz Freire），国王若奥四世下令将他押回葡萄牙并扣留其全部财产。施罗保后因“阿达拉雅圣母（Nossa Senhora da Atalaya）”号旗舰从果阿赴葡萄牙途中沉没，患重病死于黑人地区（Cafraria）的荒无人烟的海岸。^②

12月，南明钦差大臣毕方济在3000名军队的护送下，安全抵达澳门。毕方济出使澳门虽为弘光帝之钦使，弘光被俘后，即位于福州的隆武帝“仍以弘光委任之事委诸方济”，故毕方济仍然作为南明政权的钦差使臣进入澳门。^③ 毕方济入城的那一天，澳门城的所有文武官员都出城前往迎接。毕神父在一片欢呼声中进了城。神父带来的随从很多，并高举着红色底子上绘有十字架的丝织旗，这一点完全出乎澳门人的意料。毕方济这次出使，带来了弘光、隆武二帝旨谕：准这一年内入澳门口岸的商船货物，得免缴纳入口税（此数很大，达1200色勒芬），又赐澳门葡人可自由出入广州经商，并允准在广州城内建教堂。^④

12月，流亡澳门的3000名汉族士人（内有750名妇女）乘坐7艘葡萄牙船离开澳门经巴达维亚赴印度果阿。^⑤

①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535—536页；顾卫民：《17世纪罗马教廷与葡萄牙在中国传教事业上的合作与矛盾》，载《文化杂志》第46期，2003年。

②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 82.

③ 萧若瑟：《圣教史略》卷12《毕方济出使》，第87页；费赖之：《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163页。

④ 裴化行：《明末耶稣会士一封信（1645年12月2日）考释》，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5号，第4855—4856页。

⑤ 博克塞：《贡萨洛·西凯拉·索萨船长的使团》，第36页。